

毛澤東與故宮博物院的故事

文化自信是一個國家、一個民族發展中更基本、更深沉、更持久的力量。毛澤東、周恩來、朱德等新中國開國領袖們，對中華傳統文化有精湛造詣，因而深沉地熱愛自己的民族和祖國，使他們在災難深重的舊中國、在抗日戰爭的最艱難時期，都能看到國家和民族的未來，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己任。也因此，他們始終以中華傳人自勉、以保護弘揚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己任，對中華文明結晶和寶庫的故宮博物院，傾注了厚愛與信任。

姜舜源（文、圖）



▼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日，毛主席在北京紫禁城西角樓。



◀一九四三年毛澤東為延安中央黨校題辭「實事求是」刻石（原件）。中國國家博物館

十日，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長王冶秋致信，「主席：你寫給鄭振鐸局長的信及王船山墨蹟一卷，均早收到，……墨蹟已請專家鑒定，確係真跡。現已將此卷撥交故宮博物院收藏，以備陳列。」隨手寫成的信件，沒有官樣文章；主席交下的東西，竟也要鑒定。領袖與部下之間沒有距離感。十二日，主席在這封信上批示道：「此物似乎只可收藏，不必陳列展覽。」希望不要宣傳自己。

三臨城上 流連往返

一九五四年五月十七日下午四點，中央保衛局給故宮博物院保衛科一個電話，通知說毛澤東要來故宮。不一會兒，兩輛小汽車開進了故宮神武門。毛澤東從小汽車裏走出來，身著灰色呢子衣服，腳穿白底布鞋，手拿一根小竹竿，就上了神武門東階道。登上神武門城樓，見到城牆上長的苜蓿草時說：「這是苜蓿吧，是好東西。」另據故老相傳，故宮的苜蓿是元世祖忽必烈營建元大內時，由蒙古草原引入北京的。在神武門城樓上，毛澤東瀏覽了故宮全景，然後沿城牆向東走去。經過東北角樓，轉而沿城牆向南，來到東華門城樓，在那停下來休息。毛澤東和同行的同事及陪同的故宮保衛科長韓炳文一邊吃橘子，一邊交談。毛澤東問了院裏機構設置，各部門分工情況，又問韓炳文的文化程度，當聽到他是小學文化，

毛澤東鼓勵說：「那還要好好學文化呀！」走到午門，毛澤東參觀了設在那裏的中國歷史博物館（今中國國家博物館）出土文物展。此次參觀前後為兩小時五十五分鐘。從午門城樓下來，天色已晚，他向大家揮手告別，乘車返回中南海。

隔了一天，五月十九日下午，毛澤東又來到故宮，車進午門，登上午門城樓，繼續參觀午門城樓內中國歷史博物館出土文物展覽，前後歷時一小時三十分鐘。

五月二十日下午五點，毛澤東第三次來到紫禁城，車進神武門，由神武門西階道登上神武門城樓，沿城牆向西走，至西北角樓。毛澤東在此留下了珍貴的照片。毛澤東滿面笑容，眺望紫禁城宮殿。此時夕陽西下，琉璃瓦頂金光閃爍，紅色宮牆流輝四溢，景象浩瀚壯觀，詩人毛澤東定是心潮澎湃，浮想聯翩。從西北角樓向南，過西華門，經西南角樓，從午門城樓下來時，已是晚七點。他還想參觀宮殿之內和文物展覽，但由於當時院內沒有照明設備，沒能繼續參觀。後來，故宮博物院院長吳仲超專門準備了燈籠等照明設備，向主席辦公室去電話，歡迎主席在任何時間來故宮。然而，從那以後，毛澤東再也沒有時間來故宮。

禮尚往來 得益前賢

毛澤東給故宮送藏文物，也向故宮借閱書畫，每次借閱，都有清單，並及時送還。逢先知在《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》一文中回憶，毛澤東酷愛字帖，讓秘書把他所有的字帖都集中起來放在身邊，「除了買字帖供毛澤東觀賞，我們有時還到故宮借一些名書法家的真跡給他看。一九五九年十月，田家英和陳秉忱向故宮借了二十件字畫，其中八件是明代大書法家的草書，包括解縉、張弼、傅山、文徵明、董其昌等。」故宮至今保存着兩份毛澤東借閱古書畫的目錄，一次是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三日，由中央辦公廳陳秉忱經手，借閱書畫二十件，這與逢先知的記載相符；另一次是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一日，由田家英接洽辦理，借閱書畫二十六件。這兩次所借均為明清兩代名人佳作。毛澤東於繪畫，喜愛山水花卉；於書法，喜愛草書，其草書作品大氣磅礴，深得歷代名家之神韻，而又體現出偉大革命家的宏偉氣魄，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新時代結出的文化碩果。

（作者為中國歷史文化學者、北京市檔案學會副理事長、北京博物館學會學術委員會主任、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員）

一九一一年，當時年僅十三歲的周恩來，發出「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」的誓言；一九三五年，毛澤東著《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》指出：「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，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，有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。」

平津戰役 保護故宮

一九四八年底，遼瀋戰役勝利，人民解放軍同時圍攻北平。在人民解放軍包圍和孤立了北平，完全可以克敵制勝的情況下，為了保護故宮，保護北京城，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、中央軍委，作出了爭取和平解放北平的決策。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六日，毛澤東在為中央軍委起草《關於積極準備攻城部署給平津前線總前委聶榮臻等負責人的電報》中指示：「此次攻城，必須做出精密計劃，力求避免破壞故宮、大學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價值的文化古蹟。你們務使各縱隊首長明瞭並確守這一點。」

毛澤東曾風趣地把進北京城比作「進京趕考」。毛澤東的命令，代表了中國共產黨人作為中華文化的優秀傳人，自覺肩負起保護、弘揚中華文化的歷史大任，付出再大代價，也要保衛故宮和以故宮為代表的中華歷史文化遺產的態度。新中國成立後，中央人民政府於一九五〇年五月二十四日，首先頒布了《禁止珍貴文物圖書出口暫行辦法》和《古文化遺址及古墓葬之調查發掘暫行辦法》這兩部保護歷史文物的法令，接着頒布了一系列文物保護法令。

毛澤東與故宮博物院有一段特殊淵源：故宮博物院創始人、首任院長易培基，是毛澤東在湖南第一師範學校讀書時的國文老師、最敬重的師長之一。易培基任該校校長期間，除聘請毛澤東擔任該校附屬小學主事（校長）以外，還支持湖南早期共產主義組織新民學會，學校每年撥款五百銀元作學會的活動經費。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曾說：「易培基是我的恩師，他是個好人啊，幫過我好多次。」另外，毛澤東在五四運動前後，曾隨其

恩師楊昌濟到京，任北京大學圖書館管理員。北大校舍即今故宮神武門東的五四大街「紅樓」，毛澤東當時住在景山東街吉祥所胡同。一九三六年在延安，毛澤東曾向美國記者埃德加·斯諾談起故宮留給他的美好記憶。

獲贈文物 直撥故宮

故宮博物院有一些文物，是上世紀五十年代一些收藏家，以呈送毛澤東的名義捐獻國家的。毛澤東都是當即指示中共中央辦公廳，直接轉送文化部文物局交故宮博物院收藏，像著名收藏家張伯駒所獻唐代李白《上陽臺》帖；但有一些是友人送給毛澤東的禮物，只要是文物，毛澤東就指示送交故宮博物院，像「船山學社」友人姚虞琴所贈王船山手跡《雙鶴瑞舞賦》、友人蔣澤霖所贈清初錢東璧臨《蘭亭十三跋》。

《上陽臺》帖是唐代大詩人李白傳世唯一手跡，書風縱逸奔放，筆墨蒼勁古樸，字形厚重變幻，筆意連綿不絕。

王船山，即明末清初思想家、文學家王夫之，湖南衡陽人，船山是他的字或號。毛澤東倡導的「實事求是」學風和思想路線，就是在繼承和發展王夫之等古代思想家基礎上提出的。清初南方各地抗清復明鬥爭此起彼伏，王夫之作《雙鶴瑞舞賦》，對「三藩」之一定南王孔有德之婿廣西將軍孫延齡，起兵「胥匡中夏」寄予支持和期望。姚虞琴是我國近現代著名畫家，浙江餘杭人，早年在長沙研究王船山學術思想。毛澤東早年在長沙時，也曾在「船山學社」研求學問，因此二人是社友。日寇佔領期間，姚虞琴以賣畫為生，畫蘭不帶土，以寓國土淪陷之意。新中國成立使他欣喜萬分，將自己珍藏的這件寄託愛國思想的墨寶，交由友人、中央人民政府委員陳叔通先生轉贈毛澤東。

毛澤東接到這件法書，於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日交給了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局長鄭振鐸。他在給鄭振鐸的信中說：「據云此種手跡甚為稀有，今送至兄處，請為保存為盼！」十二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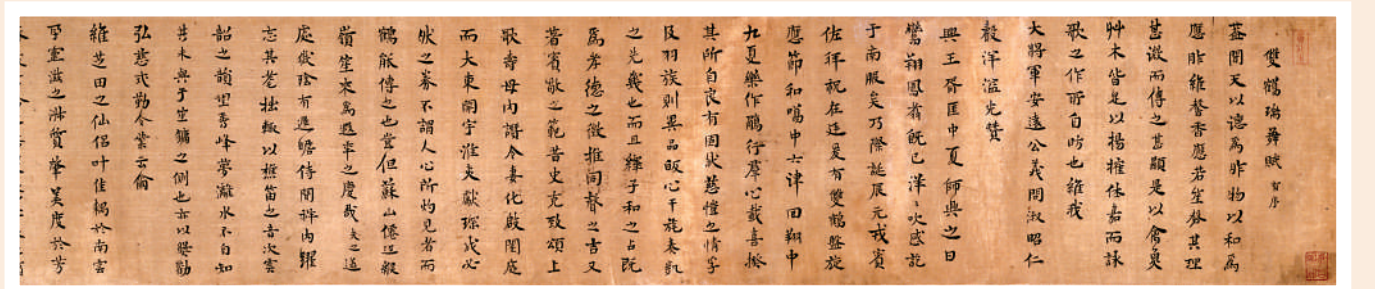


▲李白《上陽臺》帖（部分）。故宮博物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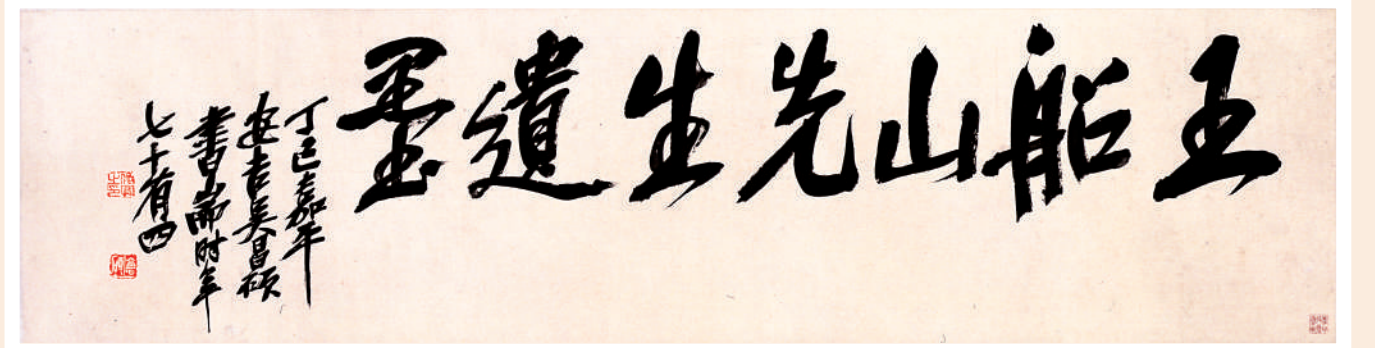


▲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日，王冶秋就毛澤東轉交王船山手跡致毛澤東的信及毛澤東十二日批示（影印件）。

▲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日，毛澤東就友人轉贈王船山手跡致鄭振鐸信內頁（影印件）。



▲王船山手跡《雙鶴瑞舞賦》卷正文（部分）。故宮博物院



▲王船山手跡《雙鶴瑞舞賦》卷引首近代吳昌碩題語。故宮博物院

